

比较教育学科视野中的“教育借鉴”

褚远辉 辉进宇

(大理学院, 云南省、大理市, 671003)

摘要：学习别国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并以此为本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与直接原因。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教育借鉴成为了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同时，比较教育学科视野中的“教育借鉴”又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在比较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借鉴本身的内涵、形式、特点和要求等都有着质的区别，明显地表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教育借鉴；内涵；要求；层次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比较教育学科产生于借鉴别国教育，以改进本国教育这一特定的社会需求。如此，教育借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尽管在当代社会，随着社会和教育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在不断拓展，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非实用性价值取向（如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教育的价值取向，生成新的教育理论和知识的价值取向，探索和揭示教育规律的价值取向，学科构建的价值取向，教育审美的价值取向以及教育批判的价值取向等）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强化，但毋庸置疑，在比较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体系和结构中教育借鉴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家和民族之间教育的相互借鉴直接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的产生，并且教育借鉴的研究取向贯穿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始终。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在比较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借鉴在内涵、形式、特点及要求等方面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研究教育借鉴本身的发展和演变，有助于我们认识比较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结构性变迁并以此为切入点在更高的层次上揭示比较教育研究的本质和规律等。

从总体上看，比较教育学科视野中的教育借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和层次。

一、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教育借鉴发展的最初层次

教育借鉴是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从理论上讲，比较教育研究的

价值取向反映的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倾向以及比较教育研究与研究者需要之间的关系,它本无层次和高低之分。但从比较教育特定价值取向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者、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因素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还是有层次和高低之别的。教育借鉴就是如此,它本身就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在比较教育漫长的史前期和学科初创阶段就存在着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教育借鉴活动,而此时教育借鉴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全盘引进和吸收”。如早在比较教育的史前期,不同国家、民族和区域之间的文化与教育交流活动就广泛存在,而这个时候开展教育比较活动的动机主要是“同时产生于全然的好奇心(我们想知道其它国家的人民如何教育他们的年轻人)和实践性难题(我们想知道其它国家的人民如何解决那些在我们看来与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相似或相同的问题)。”^[1]这个时候开展的教育比较活动是零星、分散和不系统的,并且主要是通过游学、旅游、访问和战争等形式来进行的;同时,还存在着照抄照搬和简单移植的倾向。就是到了比较教育学科初创的时期,这一学科研究的特点同样存在。如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朱利安之所以把外国的教育经验和事实用图表的形式排列出来,实际上就是为全盘引进和简单移植服务的。同样地,移植性借鉴的思想在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库森、霍勒斯·曼和巴纳德等的比较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移植性借鉴在我国早期比较教育研究中表现得更充分和典型。如比较教育研究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的三个近现代学制(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壬戌学制)就完全是以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学制为蓝本,并以全盘移植的方式引进来的。直到现在,在我国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中,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具体做法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比较教育学领域,这一现象和特点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比较教育成为对国外情况的介绍、翻译,后面再加上简短的、例行的不痛不痒的启示和感叹,有的干脆感叹也不发了(这种感叹往往是含着‘别人是这样,我们也该这样’之意)。(真正的)介绍、翻译当然也是需要人去做,但如果大家都在做这种事情,情况就有点不妙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失落的正是对本国教育实践的关怀。”^[2]也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媚外’与‘移植’”,并从六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1、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观点、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流派,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教育做法等;2、将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教育理论或教育流派视为经典和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秘诀,信奉“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他们在谈论教育问题时“言必称希腊”;3、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以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为主,但其研究没有与中国教育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过程中

翻译、注释和简单移植的痕迹和成分比较浓厚；4、他们把国外某种或某些教育理论流派和主张直接作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由于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迷茫和非适切性，加之脱离中国的国情和教育的实际，改革的实际过程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较大，导致改革步履为艰，甚至走向死胡同；5、他们撰写教育科研论文和著作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语句不通顺，概念界定不明确、似是而非；6、也许可能是由于译著者本人也没有真正理解和弄明白，亦或是由于翻译上的原因等，他们所介绍的一些国外教育理论十分晦涩难懂，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这样的书籍和论文读了以后不仅不能给人以任何启发，相反使人感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3] 等等。

当然，就教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而言，无论是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出于发展阶段和研究水平上的差异，在开始阶段出现移植性的引进和借鉴是必要的，因为教育借鉴的第一要义就是输入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经验和做法，并与本国的教育相对比，没有移植和引入就无所谓什么借鉴了。但如果在教育借鉴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教育借鉴完全等同于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由于这样的输入并没有与本国教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并实现国外教育制度、经验和理论的本土化与地方化，则这样的教育借鉴对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和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二、选择性借鉴——教育借鉴发展的第二层次

其实，从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移植性借鉴并不多见，并且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初期发生在欧洲各国之间的移植性借鉴还具有其客观的原因。如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初期，相互教育借鉴的对象之所以主要集中在西欧各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就是“由一种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和一种共同的宗教联系在一起的。”^[4]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等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教育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同的社会基础，因而发生在这些国家之间的移植性教育借鉴不会有太多和太大的困难和不适应之处。但即便是这样，在全盘简单移植别国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后，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教育借鉴往往就进入了选择性借鉴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教育借鉴的主要特点就是反对对别国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的照抄照搬，开始强调在学习和引进别国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时一定要与本国教育的实际相结合，对别国的教育制度和经验等要有所取舍和扬弃。应该说，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选择性借鉴是教育借鉴的主流，也构成了比较教育研究最基本和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回顾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选择性借鉴的思想其实是十分丰富的。如法国比较教育学家库森就指出了教育借鉴必须具有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确定法国人已清楚地认识

的特定的需求；二是要描述国外满足类似需求已证明是成功的东西。”^[5]在其中就包含了选择性借鉴的思想。又如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霍勒斯·曼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借鉴别国教育制度、经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他就提出：“如果我们理智一些，学习别人的经验，而不是坐等因我们的错误而致的糟糕结果，我们就有可能逃避其它一些社会正在遭受的巨大灾难。”^[6]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比较教育研究和教育借鉴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由于本国和其它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理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必然给教育借鉴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因此，他主张教育借鉴要与本国教育的实际相结合，他的选择性教育借鉴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有限度借鉴”的观点上。而比较教育学家巴纳德、萨德勒、康德尔、汉斯和施奈德等人则是分析和研究了影响和制约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并从“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分析视角研究了在进行教育借鉴时要注意的原则和问题等，由此也把选择性借鉴的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现当代社会，简单的全盘移植的思想和实践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已不多见，选择性教育借鉴的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比较教育的“借鉴功能也随着教育发展水平而有所区别，在国家教育制度草创阶段，比较教育的借鉴功能以直接移植为主；但到了教育高度发展阶段，就必须坚持理性借鉴，从探讨教育发展规律上来指导教育改革。”^[7]

三、本土适应与本土生长——教育借鉴发展的第三层次

“本土化”是与“全球化”、“国际化”和“一体化”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实现国外教育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成为了当代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教育借鉴而言，在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的过程中如何与本国教育的实际结合起来，并把它内化成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外域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的本土化和本土生长，这已经成为当下比较教育研究和教育借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外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本土化”的研究愿景也使教育借鉴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

当然，对于什么是“本土化”以及对本土化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在学术界一直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分歧。如有的学者就认为“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凡本地原有的文化，无论是源于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还是现实的活的本土文化，都不存在什么本土‘化’的问题”，^[8]倒是来源于‘他者’的文化存在着如何适应民族土壤的问题，即如何‘化’的问题。并进而认为，“所谓‘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非西方文化的侵淫”。^[9]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本土化是解决在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食洋不化”和“洋为中用”的关键。我们认为，把“本土化”一味说成是一个

西方文化殖民的过程而否定本土化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在教育借鉴的过程中实现国外教育的本土化无疑是实现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教育借鉴中的本土化价值取向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就其社会政治背景来看,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就其学科和学术背景来看,它则是与长期以来在比较教育话语体系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密不可分。而比较教育学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去殖民化”在客观上要求教育借鉴时必须走本土化和本土生长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本土化”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旨趣在于学习和借鉴别国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等,但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在实现“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引进”和“借鉴”来看“教育本土化”。引进和借鉴是比较教育重要的学科性质和特点,而引进和借鉴从来就是与吸收、同化、内化及本土化等紧密联系的一对范畴。如果说前者是手段、途径和方法的话,后者就是目的与结果;其次,从“比较”来看“教育本土化”。“比较”是比较教育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比较教育的重要学科性质和方法论基础。在比较教育的研究中,通过比较,就是要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的教育加以对比,目的是要在了解和掌握各国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异同及优劣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教育的实际开展所谓的“扬弃”。故“比较”是教育本土化的前置性条件;再次,从“跨文化(或跨国)性”来看“教育本土化”。跨文化(或跨国)性是比较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性质和特点,而教育本土化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他者”的存在,并且“他者”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的教育之间发生了某种形式的交流、沟通和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一定存在着一个外界的参照系。所以,“跨文化(跨国)性”构成了教育本土化这一命题成立的先决条件;最后,从“异域性”来看“教育本土化”。异域性也是比较教育这一学科的重要性质和特点,而正是异域性提出了研究教育本土化的要求与需要。因为,如果不存在什么差异,也就无所谓什么“本土化”了。基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教育本土化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也有学者主张用“本土生长”的概念)。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来讲,更应该如此。

在教育借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本土适应、本土生长和本土化的价值取向固然与选择性借鉴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互为基础和条件,但本土化的价值取向是选择性借鉴思想的系统化和进一步深化,它是选择性借鉴思想的继承和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四、创新与发展——教育借鉴发展的最高层次

教育借鉴是一个吸收古今中外教育发展中的有益经验,以改进本国教育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在当今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的教育都与其它国家的教育发生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与国际教育接轨就意味着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能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系统里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借鉴其它国家教育发展的经验是每个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但是借鉴只是手段和途径,借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和归宿,教育借鉴还必须与创新和发展相结合,因为只有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借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借鉴,才是借鉴的最高层次,也只有创新性的借鉴才能达到教育借鉴的最终目的。也正是根据教育借鉴中的创新的程度,我们可以把教育借鉴划分为移植式的借鉴、选择性的借鉴和创新性的借鉴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和水平,而创新性的借鉴才是推动本国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如此,在创新基础上的借鉴也就必然成为比较教育研究以及教育借鉴最高的价值取向。如有学者就对后现代比较教育的特点和价值作了如下描述:“它是由比较教育者所从事的独特的教育创造实践活动;它所面对的是正在生成和发展着的各种教育存在和教育发展单元;它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这些教育存在和发展单元之间发现、创造、建立和发展新的教育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它对现有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批判、反思、改造和重建,以生成新事物、新价值、新意义……由于它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所以特别需要和看重这一领域人的创造性、想像力、主体精神和首创精神……”^[10]

教育借鉴是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同时,教育借鉴也是促进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教育借鉴的意义和作用更加凸现了出来。也正是基于对教育借鉴重要性的认识,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比较教育学视野中的教育借鉴的发展阶段,旨在认识教育借鉴本身,更在于认识和揭示比较教育研究的本质和规律。

参考文献

- [1]Philip E. Jones.Comparative Education:purpose and Method,Queensland:Universite of queensland Press,1971,reprinted 1973.1.
- [2]彭正梅.教育借鉴的困惑——关于比较教育使命的反思[J].外国教育资料,1999,(4): 30-31.
- [3]褚远辉.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媚外”与“移植”[J].教育评论,2008,(1):1.
- [4]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藤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24.
- [5]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4-45.
- [6]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
- [7]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当代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7.

[8]项贤明.教育：全球化、本土化与本土生长[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34.

[9]项贤明.教育：全球化、本土化与本土生长[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34.

[10]李现平.比较教育身份危机之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9.

“Educational Borrowing” in the Field of Comprative Education

CHU Yuanhui, HUI Jinyu

Abstract: Learning from other countries'educational systems,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and applying them to the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in one's own country is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and direct cause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cause of this recognition, educational borrowing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a key concept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educational borrowing”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 a developing concep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meanings, forms,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are different and show typical features of different stages.

Key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educational borrowing; meaning; requirement; level

作者简介:

褚远辉（1967 - ）男，汉族，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二级），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辉进宇（1971—）女，汉族，大理学院工程学院，副教授，教育硕士。

